

Rens Bod

DE VERGETEN
WETENSCHAPPEN

Een geschiedenis
van de humaniora

人文学 的 历史

被遗忘的科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荷兰)任博德 著
徐德林 译

Nederlands
letterenfonds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本书的出版得到
荷兰文学基金会的资助

DE VERGETEN
WETENSCHAPPEN

Een geschiedenis van de humaniora

人文学的历史

被遗忘的科学

〔荷兰〕任博德 (Rens Bod) 著 徐德林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57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学的历史: 被遗忘的科学/(荷兰)任博德(Rens Bod)著;徐德林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301-28701-9

I. ①人… II. ①任… ②徐… III. ①人文科学—历史—研究—世界
IV. ①C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4918号

DE VERGETEN WETENSCHAPPEN

Copyright © Rens Bod,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7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
RENWENXUE DE LISHI

著作责任者 [荷兰]任博德(Rens Bod)著 徐德林 译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701-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minyanyun@163.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印刷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6.75印张 407千字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寻求原则与模式	1
第二章 古代:“人文学”的发端	11
第一节 语言学:语法的诞生	11
第二节 历史编纂学·史料问题与历史的形式	20
第三节 语文学·文本修复问题	33
第四节 音乐学·和声与旋律法则	40
第五节 艺术理论·世界的视觉复制	48
第六节 逻辑学·推理规则	57
第七节 修辞学·演讲术作为一门学科	63
第八节 诗学·文学与戏剧研究	71
概要:古代世界人文学的共通模式	77
第三章 中世纪:普遍与特殊	81
第一节 语言学·从规则到范例	81
第二节 历史编纂学·通史与形式传述理论	92
第三节 语文学·缮写员、百科全书编纂者与译者	113
第四节 音乐学:音乐实践的形式化	119
第五节 艺术理论·遵循与打破规则	129
第六节 逻辑学·真实三段论的法则	136
第七节 修辞学与诗学·形形色色的规则	143
概要:中世纪人文学的创新	152

第四章 早期近代:人文学的统一	156
第一节 语文学·早期近代的学问女皇	156
第二节 历史编纂学·语文学传播:世界观的世俗化	175
第三节 语言学与逻辑学:在人文主义的束缚下	198
第四节 音乐学·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缺失一环	214
第五节 艺术理论·视觉世界表征的一个转折点	228
第六节 修辞学·包罗万象(抑或空空如也)的科学?	249
第七节 诗学·绝境中的古典主义	253
概要:早期近代人文学中有进步吗?	261
第五章 现代:复兴的人文学	273
第一节 历史编纂学·世界的历史化	274
第二节 语文学:一门完备的学科?	295
第三节 语言学与逻辑学·语言与意义的法则	305
第四节 音乐学·系统与历史	327
第五节 艺术史与考古学·走向视觉语文学	338
第六节 文学与戏剧研究·修辞学与诗学的神奇消失	354
第七节 媒体与文化研究·从电影研究到新媒体	367
概要:现代人文学中有断裂吗?	374
第六章 结论·改变世界的人文学洞见	381
附录 关于方法的说明	394
索引	396

第一章 前言：寻求原则与模式

本书是书写人文学比较史的首次尝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学与科学之间并无区隔。无论一个人希望理解精神还是自然的秘密，那都属于相同的智识活动。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同时研究音乐和数学，比鲁尼（al-Biruni）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甚至科学革命的代表性人物——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Kepler）和牛顿（Newton）——也同时从事语文学和自然世界研究。这就提出了人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区隔在何等程度上是本质的还是人为的这一问题。它们的研究方法的区别在哪里？它们何时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人文学的洞见是否曾促成重大发现？1959年，C. P. 斯诺（C. P. Snow）引发的著名的“两种文化论争”仅仅是过去50年的一种现象呢，还是始终存在？^① 回答类似问题时，人文学与科学二者的历史书写是不可或缺的。

人文学科何为？它就像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倘若你不追问，我们了然在胸，但倘若你追问，我们则一片茫然。^② 19世纪以降，人文学科通常被定义为那些考察人类精神表达的学科。^③ 音乐学、文学理论、语言学、视觉艺术研究，悉数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有别于属于科学范畴的自然研究。类似的是，对社会语境中人类的研究属于社会科学。但是，这些定义并不能令人满意。数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心智的产物，但它并不被视为是一门人文学科。因此，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可能更加切实

① Charles Percy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② St Augustine, *Confessions*, Book XI, chapter XX.

③ Wilhelm Dilthey, *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Versuch einer Grundlegung für das Studium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Geschichte*, Teubner 1883, reprinted: 1979.

可行：人文学科是在人文系科被讲授、研习的学科。根据这一“定义”，人文学科通常包括语言学、音乐学、语文学、文学理论、历史学科（包括艺术史和考古学），以及电影与电视研究等较新的领域。在一些国家，神学和哲学也是在人文系科被讲授的，而在另一些国家，它们自成系科。正如我在下文中要解释的那样，我在本书中将主要聚焦“经验主义的”人文学科。

这马上就提出了一个概念性问题——假如它们是由人创造的，那么人类精神的表达，比如语言、文学、音乐和艺术，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被称作“经验主义的”？人文学科主要研究“精神世界”而不是外部世界，事实并非如此吗？诚然，人文学科的产物一直都是为人所创造，但当这些产物显现为手稿、乐曲、文学作品、雕塑、语法书籍、戏剧、诗歌和绘画等形式的时候，它们显然和其他研究主题一样，是向经验研究和各种假说的提出开放的。我们将看到，自古以来，人文学科中的这些研究主题实际上一一直在接触关乎假定模式与阐释的各种假说与评价。

我将在本书中证明从古至今的人文学者如何处理他们的材料（语言、文本、音乐、文学、戏剧和艺术），以及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我要强调，或许不必要，人文学的历史并非关于音乐、艺术或者文学的历史，而是关于音乐学、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历史。这种历史始于最早的人文活动在古代的诞生。然而，我们应当记住的是，直到 19 世纪，人文学科才被视为一个融贯的学问分支，我们的分类因此完完全全属于 19 世纪。^① 比如，直到 18 世纪后期，音乐学（也）被视为是一种数学活动，属于“四艺”，以天文、几何和算术为伴。关于精神世界的知识与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之间的区隔，在近代早期甚至尚未被划分。然而，目前被认为将出现在人文学保护伞之下的学科，已然被系统地排除在现有科学史之外。因此，我不会把人文学的历史限定在 19、20 世纪（当时的人文学科被置于了一种标准之下）。相反，我将从我们最初发现这些活动的地方——古代——出发。

为什么有人希望割裂人文学与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志在一种包括所有（强调为作者所加，下同——译者）学术活动——从自然、社会到人文——

① Wilhelm Dilthey, *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Versuch einer Grundlegung für das Studium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Geschichte*, Teubner 1883, reprinted: 1979.

的历史? 1930 年代,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尝试过勉力书写一种包括所有学科的历史。^①然而,他的工作是基于一种高度实证主义的进步概念,其结果并未超越 14 世纪,而且即使在那个时期,人文学在萨顿的历史中占据着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虽然他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语言学和音乐学,但他排除了其他人文学科,比如艺术史和文学理论。根据萨顿,不同于音乐研究,视觉艺术(绘画、建筑和雕塑)的历史仅仅从“外部”让人了解学术,无助于学术“进步”。^②萨顿并未进一步阐释这一问题,但他似乎是在指向艺术本身的历史,而不是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史。

我们将看到艺术史像文学理论一样,是人文学历史的基本要素。早至公元前 3 世纪以降,亚历山大学派的学者们便在描述现实的时候,勉力阐明艺术家对“正确”比例的探求。公元 1 世纪,普林尼(Pliny)详细描述了古典雕塑家何以坚守严格的比例,比如头部尺寸和身体之间的比例;维特鲁威(Vitruvius)介绍了古代神殿的比例。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比例与见诸(毕达哥拉斯、托勒密[Ptolemy]及其他人的)音乐和声研究的比例相一致。类似关系也显示在印度和中国的艺术与音乐之中(比如婆罗多牟尼[Bharata Muni]与刘安)。因此,倘若我们希望正确理解人文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就应该把音乐研究(音乐学)和艺术研究(艺术史)包括在内。然而,在这二者中,萨顿仅仅讨论了音乐学,而且主要是因为它对科学进步的重要性。萨顿的著作并非是关于学问与科学的通史,更不必说是人文学的通史。可以说,汉斯-约阿希姆·施杜里希(Hans-Joachim Störig)在 1953 年对科学史的概述同样如此。^③虽然施杜里希的著作并非是基于对进步的实证主义信仰,但他仅仅把语言学和历史编纂学算做了人文学科。^④

① George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I, II, III*, Baltimore: Williams and Wilkins, 1931/1947.

② George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I*, 5, Baltimore: Williams and Wilkins, 1931/1947.

③ Hans-Joachim Störig, *Kleine Welt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 Fischer, 1953.

④ 虽然不乏杰作,比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 1966)、乔治·古斯多夫(Georges Gusdorf)的《人文学科与西方思想》(*Les Sciences humaines et la pensée occidentale*, 1967),但这些主要是哲学性质的,聚焦于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学(被收录在内的有语言学与历史编纂学,但别无其他人文学科)。

因此,在内容与时代两方面,人文学通史依旧“曝光不足”。这一点日渐引人注目,因为19世纪以降,科学史已然被书写。^①最近,社会科学通史也得到了研究。^②换言之,从一种历史编纂学的观点来看,人文学的历史是因其缺席而引人注目的。思想史上的这一显而易见的空白何以才能被人理解呢?一种解释将在本书中显影出来,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人文学已然变得日益碎片化——不同于科学,其间似乎已然发生相反的情况。当下的科学史编纂通常选取物理学作为核心学科,随之其他科学(化学、生物学与地质学)得到讨论和比较。对人文学的历史而言,这样的一种方法即便不是不可能也会难得多。并没有所有其他学科可以效仿的核心人文学科——虽然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存在诸多共有的人文实践与方法论。迄今为止,已然被书写的为数不多的历史都是单个人文学科的历史,比如语言学史、^③文学理论史,^④以及史学史。^⑤不同学科中的方法与原则之间的联系鲜有被建立。这已然导致了奇怪的情势。比如,在17世纪的英国,威廉·霍尔德(William Holder)同时撰写了彼此相关的语言学和音乐学著作,但他通常被

① 在诸多自然科学史著述中,最早的之一是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的《归纳科学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共3卷,1837)。后来的经典是斯蒂芬·梅森(Stephen Mason)的《科学史》(*A History of the Sciences*, MacMillan, 1962)、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更晚近的一些经典之作包括詹姆斯·麦克莱伦(James McClellan)与哈罗德·多恩(Harold Dorn)的《世界史中的科学与技术导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弗雷德里克·格里高利(Frederick Gregory)的《西方历史中的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 in Western History*, Wadsworth Publishing, 2007)。

② 关于社会或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s)(不能与人文学[humanities]混为一谈)的历史的代表作包括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的《诺顿人类科学史》(*The Norto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orton and Company, 1997)、斯科特·戈登(Scott Gordon)的《社会科学的历史与哲学引论》(*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1993)、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与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的《剑桥科学史卷7:现代社会科学》(*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 比如 R. H. Robins,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Longman, 1997。

④ 比如 Richard Harland, *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⑤ 比如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视为两个不同的人。在中国汉代,司马迁设计了一种同时关乎历史编纂学与诗学的叙事方案,但他仅仅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为人所知。

这就意味着这些领域的一种比较法的、跨学科的历史必不可少。而且,我们不能将自己限定在某一地区。事实是几乎不存在人文学的历史可以被孤立考察的地方。比如,帕尼尼(Panini)的印度语言学首先渗透到了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之后对欧洲的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模式的发现而言,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与修昔底德[Thucydides])、中国(司马迁)和非洲(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历史学家全都“发现了”崛起、鼎盛与衰落这一不断循环的历史模式。尽管如此,单个人文学科的历史编纂经常局限于西方传统的范围之内,没有尝试去揭示不同地区之间引人注目的互动。^① 本书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勉力揭示这样的相互影响,虽然全球视野下的人文学历史是很难的,因为很多史料尚无法获得。^② 我深知我在本书中给予西方人文学的关注度是有失均衡的。但除欧洲与美洲之外,我还将讨论印度、中国、伊斯兰文明与非洲,对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也有所涉猎。任何未来的人文学世界史还应当包括其他地区——从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到日本。从来就不存在遗漏这些或者那些地区的充足理由。充其量日本人文学科的历史可能多少有些孤立地结束于我们当下的概述之中,因为它们对我们所讨论地区的影响不及它们所受到的影响(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外——参见第六章)。

然而,从如此庞大数量的历史资料中,选择何以能够进行?一如存在许多可能的科学史,所以,我的描述将是许多可能的人文学历史之一。在本书

① 甚至新近出版的九卷本《剑桥文学批评史》(*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也都局限于西方文学批评,而这种实践(地区间的互动)在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已存在一千余年。然而,并非所有历史概述都有这个缺陷,比如《历史学家和历史书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Routledge, 1999)便旨在覆盖全球。同样,在自然科学史上,全球视野日渐流行,比如詹姆斯·麦克莱伦与哈罗德·多恩的《世界史上的科学与技术导论》,弗洛里斯·科恩(Floris Cohen)的《现代科学的产生:四种文明,一种17世纪的突破》(*How Modern Science Came into the World: Four Civilizations, One 17th-century Breakthrough*,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参见比如 Khaled El-Rouayheb, “Opening the Gate of Verification: the Forgotten Arab-Islamic Florescence of the 17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8, pp. 263—281, 2006。

中,我聚焦人文学中的一条未曾中断的线索;在我看来,我可以把它视为**基于方法原则寻求人文资料中的模式**。这条线索并非唯一的思路,但是它可以见诸一切时期和地区。而且,它赋予我的历史编纂一定程度的融贯性,随之我还可以为其他不是寻求模式的方法找到一个位置。像这样的科学史或许是过时的,或者没有说服力,但迄今为止,人文学科的历史概述一种都没有。随之出现的问题是人文学者已然发现了什么原则与模式。它们很少是“绝对”定律,就像我们在科学中所看到的那些定律一样。但自古以来,我们一直在人文资料中同时寻找地方性的、普适性的规律。这些规律的确切本质是本书的主题。第六章的结论之一是人文学与科学之间仅仅存在一种渐进区隔,以及在模式及其潜在“例外”的本质中存在一种连续体。

我们对待人文学历史的方法挑战了哲学中的一种极具支配性的观点。这种观点是由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提出的,它主张人文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主要关注理解(verstehen),而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则关注意义(erklären)。^① 根据狄尔泰,倘若人文学者去观察、计算、测量或者寻找表面规律,他们注定会失败。他们当为之事是探寻重要历史人物的动机与意图。揭示这些**内在**动机比研究人类精神的**外在**表现更加重要。在这一语境下,已然有人讨论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在对待知识的**具体**方法(它是对独特、特殊的研究)与研究的**常规**方法(它力图归纳)之间所做的区隔。^② 虽然这种观点在人文学科的哲学中很有影响,^③但它被证明与人文实践关系较少。即使是在狄尔泰的观点盛行的时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每一门人文学科中也都同时有具体和常规要素,而且后者经常占据支配地位。我们已然发现常规的、寻求模式的要素不仅见诸德·索绪尔(De Saussure)和雅各布森(Jacobson)的语言学,而且见诸拉赫曼(Lachmann)的语文学、申克(Schenker)的音乐学、普洛普(Propp)的文学理论、沃尔夫林(Wölfflin)的艺术史,以及年鉴学派的历史编纂学,仅举

① Wilhelm Dilthey, *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Versuch einer Grundlegung für das Studium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Geschichte*, Teubner 1883, reprinted: 1979, pp. 29ff.

② Wilhelm Windelband, *Geschichte und Naturwissenschaft*, Heitz, 3rd edition, 1904.

③ 参见比如 Gunter Scholz, *Zwischen Wissenschaftsanspruch und Orientierungsbedürfnis: zu Grundlage und Wandel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Suhrkamp, 1991。

几例。尽管有狄尔泰和文德尔班的构成性建议,寻求和发现人文学科中的模式的努力依然激增。不过,狄尔泰和文德尔班的著作所代表的人文学观念是有影响的,然而,这一事实主要源自它赋予人文学科的强大同一性,同一性使得人文学科能够让自己区别于并摆脱日趋重要的自然科学(参见第五章)。然而,本书将证明寻求人文学科中的原则与模式是一种持续的传统。历史编纂似乎非常理想地适合于对哲学视野进行批评性评估。

我们的比较方法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出一些决定。比如,我选择了“经典的”时期划分,即古代、中世纪、早期近代和现代。在我描述中国、印度、伊斯兰文明和非洲人文学科的时候,像这样的分期并不令人满意。因此,我也将经常参照特定地区内的时期划分,比如中国的朝代。很显然,当我们希望建立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时,无论我们选择中国的朝代、希腊的四年周期还是塔巴里(al-Tabari)的时代,任何时期划分都是有缺陷的。遵循经典的时期划分,我主要是按年代顺序、按学科讨论人文学的历史;我设法尽可能地在不同学科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人文学科的内部发展上,而不是它们的外部文化语境,无论它们多么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我已然选择的是一种编年史结构而不是一种基于主题的处理办法,因为对辨识跨越历史的主题而言,以年代为顺序的人文学科概述似乎是一种必须。^① 因此,我们将仅仅随着我们的进展揭示潜在主题,而不是事先列举它们,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它是我们在所有时期和地区都遇到的,即对人文资料中的方法原则与经验模式的持续不断的找寻。

任何思想史都面临术语—概念问题——哪些名称可以被理想地用于描述过去的学术活动? 我们可以用“音乐学”和“艺术史”等当代术语来意指古代世界的音乐研究和艺术研究而不陷入令人误解的时代错误吗? 倘若我们把历史上的智识活动硬塞进当今表达的紧身衣中,我们就会有落入一种不受欢迎的“现代主义”(presentism)的危险,于其间过去依据现在的概念与视野得到阐释。更可取的(preferred)起点是使用表示智识活动的当代术

^① 参见比如 John Pickstone, *Ways of Knowing: A New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语,比如表示诗歌和戏剧研究的**诗学**、表示语言研究的**语法**。但是,这些表达有时候是模棱两可的,就像“音乐”(musica)的情况那样,它可以表示音乐研究或者音乐本身(以及更多附带含义)。在其他情况下,具体术语是缺乏的;比如,在缺乏更好办法的情况下,艺术研究在普林尼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中,被归类到了矿物学和材料的运用之下。被用于描述印度和中国等欧洲之外地区的人文活动的各种语词则是另一难题。对此,我并没有一种稳健的解决办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在很多情况下我提到了相关人文活动的当代或者地区名称,然后替换以我心目中最连贯的术语。有时候它是历史的(比如诗学),而另一些时候,它是当下的(比如音乐研究或者音乐学)。我认为并不是每一种形式的现代主义都可以避免。而且,存在于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人文学之间的连续性似乎比原本所想象的要大。关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皮埃尔·督黑姆[Pierre Duhem]及其他人),这样的连续性自14世纪就受到了关注,但在人文学中,它似乎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过去(参见第四章和第五章概要)。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人文学”一词读起来、听起来胜过“对人类精神产物的研究”或者类似的表达。事实上,让这个术语可以推而广之到不同时期是有理由的。一如尼古拉斯·贾丁(Nicholas Jardine)已然证明的,^①并非一切时代错误都是误导性的。

因此,作为一个整体,本书讨论已然在人文学科中被发展的方法原则、已然在对人文资料(文本、语言、文学、音乐、艺术、历史)的研究中被发现的**模式**的历史。被发现的模式可能是简单的规律——包括例外——但它们也可能由语法之类复杂的规则系统组成,或者甚至包含严格的模式,比如语言中的语音演变定律,或者音乐中的和声法则。事实上,我的“模式”概念无所不包,包括可以在并不精确的规律与精确的定律之间发现的一切。暂时我不会让这一概念更加具体,因为在我的探寻中,我不希望事先排除任何“模式”。“模式”概念将渐渐具体化,我将把它与其他学科类似概念进行比较(我将在附录中,更加详细地向感兴趣于方法论的学者们讲述我的方

^① Nicholas Jardine, “Uses and Abuses of Anachronism in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s”, *History of Science*, 38, 2000, pp. 251—270.

法)。

无论原则和模式涉及人文学、科学还是社会研究的知识,我对原则和模式的探寻可能对很多人而言看起来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一些人文活动仍然是在我们的叙述的范畴之外。这是因为我们并不经常在哲学和神学中发现经验主义的探寻,其中的一部分我因此没有讨论。比如,虽然我讨论了帕尼尼和阿波罗尼奥斯·狄斯克鲁斯(Apollonius Dyscolus)的**语言学**,但孔子和柏拉图的**语言哲学**仅仅获得了“荣誉奖”。神学中关涉考察文献源头的部分将会被讨论,而思辨神学则不会被讨论。然而,我会经常描述神学和哲学对人文学的影响,但这些学科并不是本书的重点。

我对原则和模式的专注并不意味着我疏忽唯一一次的、纯属偶然的发现。谁会从人文学的历史上抹除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对特洛伊的考古发现呢?然而,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是这一发现究竟是纯属偶然还是基于方法原则的。另外,我还将考察相反驳斥模式概念的学者,他们包括从公元前3世纪的异常派论者(anomalist,又译“应由人定论者”)到20世纪的解构主义者。

我因此得出的关于人文学科及其历史的观点似乎偏向自然科学。我意欲挑战这种印象。在观察大自然的时候,还有在考察文本、艺术、诗歌和音乐的时候,寻找模式是超越时间的、无所不在的。认知科学告诉我们,人们**不可能**不这样做。然而,一如在一切其他学术之中,它致力于设法在偶然与非偶然模式之间进行有意义的区隔。当然,人文学科也关注获取对我们的文化及其价值的洞察,以及借此对我们人类自身的洞察。本书将证明也有一种悠久的寻求原则与模式的人文传统,同时为我们提供一种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的理解。这一传统长期为人所忽视,而且仅仅被归于科学。

我知道本书视野宽广。关于阅读本书的最佳方法这一问题出现了。任何人但凡希望体验寻求人文学中的原则与模式的全程冒险,都必须从头至尾阅读它。为了让读者有所收获,我将在每一节的最后总结所发现的原则与模式;我将以作为一个整体的时代的比较性概要结束每一章。希望简便、快速地了解概况的读者应当将自己限定在四个概要和结论,以及每一章开篇处的简短引言。仅仅感兴趣于某一人文主题的历史的读者,比如音乐研究,可以限定自己阅读关于音乐学——迄今为止尚未有人为之书写历史概

况的一门学科——的章节。本书包含的不是一部人文学的历史,而是 8 部(20 世纪以降甚至有 14 部)。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可以彼此独立地阅读。倘若有人在阅读本书之后,觉得需要另写一部人文学的历史,那么我的目的便已然实现。一如赫拉尔杜斯·福修斯(Gerardus Vossius)所言:“在我之后有他人,他人之后又他人,他人会比我做得更出色。”^①

^① Gerardus Vossius, *Poeticae institutiones*, Praefatio, in *Opera*, III, 1647 (without page numbers): “Exsurgent post me alii, et alii, qui felicius conentur.”

第二章 古代：“人文学”的发端

人文学科是以多种方式出现的——作为仪式的一部分、作为哲学的一种结果，有时候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我将讨论已然为每一人文学科发展出来的系统原则，以及借助这些原则获得的结果（模式）。另外，我将讨论反过来拒绝寻求模式的方法。我们将不止一次地发现，世界不同地区——从中国到印度再到希腊——的人文学科之间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但似乎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知识的分享。

第一节 语言学：语法的诞生

常言道，一切学问和科学始于希腊。然而，对语言的研究却并非如此。语言学的历史并非始于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而是印度语法学家帕尼尼。^① 不可否认，最早的字典的历史要远为久远——公元前 2000 年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n）泥板——公元前 6 世纪，孔子从哲学角度对语言进行了解释，但系统地描述作为一个整体的语言的最初尝试则是由帕尼尼在印度完成的。

印 度

直到公元 6 世纪，印度的历史都是笼罩在迷雾之中，其基础主要是源自公元前 15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的宗教典籍。数世纪以来，这

① 梵文抄本是“Pāṇini”，其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节上。

些印度教吠陀经(Vedas, 又译韦达经、韦陀经等)被僧侣阶层婆罗门(Brahman)非常准确地熟记, 仅仅以口头形式存在, 直到因为书写在公元前6世纪的出现而被整理成书。这些古老的典籍是用梵文书写的, 涉及许多人文主题, 从语言到艺术。印度对东南亚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初是通过印度教, 后来是通过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佛教。印度的影响从中国和爪哇(Java)延伸到了后来的高棉帝国(Khmer Empire)和泰国。公元前327年, 亚历山大大帝攻入远至旁遮普(Punjab)的地方, 随后印度西北部处于希腊—大夏王国(Greco-Bactrian)的领地统治之下。希腊文化让人感受到了它在印度艺术、知识和科学中的存在。希腊和罗马商人与印度进行贸易往来, 罗马皇帝接待印度使团。公元700年之后不久, 伊斯兰教传入, 而伊斯兰教对印度西北部的征服始于1200年前后。仅仅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 大多数人口皈依了伊斯兰教。1526年, 伊斯兰莫卧儿帝国(Islamic Mughal Empire)在印度建立。英国对印度事务的参与始于17世纪; 这个国家在经历漫长的殖民统治之后, 于1947年再次独立。

帕尼尼与语法的发现 虽然帕尼尼被视为语言学之父, 但我们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 甚至不知道他生活在哪个世纪。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便是他出生在前印度(现在的阿富汗)的犍陀罗(Ghandara), 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之间。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 他的见解在欧洲并不为人所知, 但到它们为人所知时, 它们彻底改变了西方语言学。帕尼尼的著述有何特别之处? 他何以不同于他的同时代希腊人——他们终归对他一无所知?

在其《八章书》(*Ashtadhyayi/Eight Books*)中, 帕尼尼把语言——此处指梵文——描述为一个包含有限数量的规则的系統, 这些规则可以被用于描述很可能无限数量的语言表达(句子)。像这样的一个系統现在被称作语法。帕尼尼的梵文语法可能是有限的, 但它实际上数量非常巨大。它包含3959条语法规则。帕尼尼语法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我们的了解而言, 帕尼